

「東亞外交史的新視野——外交史研究的新見解與展望」學術研討會的籌辦與成果

任天豪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一、我國外交史研究與近史所

「外交史」與中國傳統史學相比，是門相對年輕的學科，特別是在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之後的發展，致使外交史成為一種覆有「科學派史學」外衣的學科。此一性質在過去的時空環境下，促使外交史成為不少國內歷史學者據以倡導並頗為倚重的學科，也是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學科。是以，民國44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近史所）「籌備處」成立以來，郭廷以（1904-1975）等前輩學者便即開始以政治、外交等領域的歷史，做為近史所的發展重點，乃至以此成果樹立所謂「南港學派」的威名。也就是說，「外交史」對近史所而言，向來是其得以展現價值的基礎之一。

其次，外交史研究的成敗關鍵，在於檔案史料的運用能力，郭廷以在近史所籌備階段時的工作方針，亦著重於此事之上。（註1）也因如此，此後近史所編纂之諸多外交檔案彙編，乃成為「民國時期中外關係研究的關鍵」。且近史所日後所出版之研究專刊，便能在此基礎之上，促使外交史相關研究能在專刊內容中占有重要分量。（註2）此再印證國內外交史研究的紮根、萌芽與成長，與近史所的關係極為密切。

不過，正如外交史研究在國際學界中，已不斷受到各種挑戰的狀況類似，（註3）身為國內歷史研究領航者之一的近史所，自然

也會對國際學界的潮流進行因應與調整，也逐漸擴大自身的研究範圍，「由外交史、國際關係、政治史和制度史的研究」基礎，拓展至「遍及於文化、思想、教育、經濟、社會各方面的研究」，而諸如「區域研究」（Regional Study）等原有的分支方向，也有更深層的進展。（註4）自國家學術發展的角度來看，此一歷程不僅顯示近史所與時俱進的努力，也體現我國的歷史研究確實具有求新求變的積極態度。

不過令人意外的是，「外交史」卻竟在此氛圍之下，逐漸失去往日榮景，即連近史所檔案館所度藏的《外交部檔案》，也多為海外學人所查閱、引用的對象，國內學人的閱覽次數則日漸下滑。（註5）一旦外交史所據以言說的檔案史料乏人問津，則其研究展望自必受限，此無論對國內既有的外交史成果、或近史所的學術傳統而言，均可謂為一種遺憾。

有鑑於此，近史所內部乃在其與外交史研究關係最近之「東亞區域研究群」的構思與提案下，研擬鼓勵國內外外交史研究的計畫。最新的一項成果即是本年5月15日，假近史所檔案館中型會議室所舉辦的「東亞外交史的新視野——外交史研究的新見解與展望」學術研討會（以下簡稱會議）。會議由東亞區域研究群負責人張啟雄教授主導，計劃以近史所的資金與學術資源，邀集青年研究者投入一場以「外交史」為主旨的學術研討會，做為拓展未來可能的初步行動。

二、近史所與外交史群

既然原期望以青年研究者為主，近史所隨即思及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旗下的「中外關係與近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團隊（以下簡稱外交史群）。外交史群雖實在民國98年7月底時便已開始籌劃、（註6）並於隔年2月暫以「中華民國外交史研究群」為名，進行首次正式的籌組會議。（註7）但因感念於政大人文中心的大力支持，遂決定加入其所屬之「現代中國的形塑」大型研究計畫，從而使其改以前述「中外關係」之名，與政大人文中心合作。自外交史群組成迄今，應可謂國內唯一一支專以「外交史」為主軸的研究團隊。因此，欲以外交史為會議主要內容，外交史群自是可行的合作對象。

透過簡單的聯繫工作，近史所很快便與外交史群達成合作共識。其實在近史所原本的規劃中，是希望外交史群的成員能夠妥善利用此次機會，盡其所能提供具有價值的外交史研究成果。不過，外交史群另有想法，認為其成員在政大人文中心的支持下，已經擁有相對友善的發表園地，但其成員之外的青年學子，卻未必能有如此幸運。是故在磋商之後，決定將機會盡量供予其他學人，甚至可以在學學生為主，落實原先「拓展未來」的期望。於是，會議遂決定非以外交史群的成員為主，而將對外徵稿，募集對外交史研究有興趣的青年學人參與。也是因此之故，會議的開幕式乃由近史所所長黃克武教

授，與長年支持、指導外交史群的東海大學歷史系主任唐啟華教授先後致詞，以體現雙方的合作誠意。而黃克武所長、唐啟華教授亦均在致詞時指出，外交史研究實有不可抹滅的價值，值得雙方持續合作，以促進其發展。

在規劃之初，近史所原盼能為所內度藏之《外交部檔案》等重要外交史史料，進行詳細介紹以利推廣；尤其在近史所官網公布初步議程並開放與會報名後，更發現不少報名者乃係在學學生，使近史所決意深化報名者對外交史研究根基——即檔案史料的運用能力——的認識，而規劃以類似工作坊的議程內容。後雖因故無法安排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的介紹，卻因委由外交史群成員擔任類似之主題演講任務，（註8）且三位負責解說的外交史群成員，亦均為熟諳檔案研究的青年學者，能切實滿足近史所的規劃。因此會議在進行此一議程時，仍有相當的正面效益。更重要的是，近史所原即有意幫助與會學人，深入理解「使用」檔案而非「援引」檔案的外交史研究取向。故三位外交史群成員的演說，正準確地達到了近史所規劃此一議程的初始目標。

三、外交史群與會議

外交史群所委託的三位成員，各以中、英、日文的三種檔案為內容區分，分別進行解說。該場次以「外交史與檔案研究心得交

流」為題進行，由近史所檔案館館長張哲嘉教授擔任主持人，表達近史所對會議的全力支持。黨史館王文隆主任原就嫻熟於包括「外交部檔案」、「國史館檔案」、「英國外交文書」（Foreign Office Documents, FO）在內之各種國內外重要檔案，此次特別針對由其所主管之國民黨各類檔案，為與會學人進行介紹。王文隆首先介紹黨史館的職能，繼而馬來亞中英情報合作、韓國獨立運動兩件史事舉例，印證國民黨所藏檔案，與外交史研究的關係；再就《總裁批簽檔案》、《黨務會議紀錄》、《張羣檔案》等細部檔案，說明內容豐富的國民黨檔案，所能在理解史實方面提供的價值何在。由於會議報名欄位設有「研究領域說明」項目，與會者皆有填寫，故可知此一演講的內容，應可令為數最多的與會學人，自此一演講中獲益。

南臺科大楊子震為日本筑波大學博士，專為會議準備與日文檔案有關的介紹內容。楊子震首先十分清楚地說明使用檔案與歷史研究的學理關聯，繼而介紹日本相關檔案的類型與收藏地，最後再以自身的留日經驗，與會學人分享檔案利用的心得。因會議中至少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與會者，研究領域可與日本的檔案聯結，故演講內容也將有利於不少的與會者。

輔大蕭道中專長為冷戰國際史，熟諳英、美檔案與國內檔案的對照研究，故委其介紹美國外交文獻的工作。蕭道中表示雖因

美國外交決策的參與者眾多，因而使其外交文獻的內容極為複雜，但因其能反映美國對外政策不斷重估的過程，值得細細探索。由於美國外交文獻內涵龐大，蕭道中僅先就總統檔案與國務院檔案兩部分進行介紹，言簡意賅地說明此二種檔案的內涵、分類、形式與運用方式。最後再特別提醒使用美國外交文獻時所需特別注意之處，例如強調閱讀檔案必須全面、避免隨意摘錄；對不同機關在決策中所扮演的角色，須有清楚的認知；進行研究時，也需盡量加強對參與決策者的各種深入認識。雖然本次會議的論文，係以清季、北洋時期的時段居多，故對美國外交文獻的需求相對較低。不過演講中所提及的知識與涵養，仍是外交史研究的重要基礎，對青年學人的助益仍多。

除前述三位的演講外，會議亦以外交史群成員負責多數發表場次的評論任務。由於受選任者多為外交史群中，與發表人領域接近且已在大專院校或研究單位任職的成員，可將較新近的研究概況提供予發表人。其中，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呂慎華，以其對清末北洋時期外交史的多元檔案研究經驗，具體提出其所評論之論文恐或稍嫌過度解釋「國電」語意之處，是會議中最令與會者印象深刻的評論。（註9）國史館協修蕭李居、國家圖書館編輯黃文德、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研究員許峰源，則均自其各自之民國政事與外交、近代海軍與北洋外交、醫療合作與博覽會交流等專業

研究領域，為發表人提供深入的評論。（註10）

四、會議與我國外交史研究

另外，會議亦委請近史所許文堂、陳儀深兩位副研究員，與博士後研究人員任天豪，以及向與外交史群關係頗佳的政大歷史系廖敏淑、臺大歷史系楊典鋹兩位助理教授等，擔任評論工作，並均提出妥切的評論意見。而各場主持人黃克武所長、近史所副研究員林泉忠教授、淡江大學亞洲所陳鴻瑜教授、近史所研究員陳慈玉教授，亦在其主持的場次中，適度地提出自身看法與建議。

（註11）令發表人在年歲接近的評論人所給予的意見之外，尚能獲得知名前輩學者的指導，與所有與會學人同樣獲益匪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多數的發表人均原即歷史領域之碩、博士生，然〈近代中國的學術外交及其國際化——以參與遠東熱帶醫學會為視角〉一文之發表人，則係林口長庚醫院解剖病理科主治醫師、曾任臺灣病理學會理事長的容世明醫師。容醫師曾在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發表與醫療史相關之論文，此次則以民國23年中華民國參與第九屆遠東熱帶醫學會大會之歷程為題寫作，跨足中國近代外交史的領域。由於容醫師的參與，也令會議在近史所原訂的「世代傳承」目標之外，更意外地獲得其他收穫，如擴大參與者之領域，或促進外交史與其他學科背景者

的交流等等。

如若言及「交流」，則不能不提到此次除收有國內新進研究者的論文之外，亦接受三位海外青年學子來臺發表，分別為日本名古屋大學文學研究科的博士生程永超、北京大學歷史系的韓籍博士生李動旭，及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生吉辰。三位學人均以明清時期的外交史為題，探討朝鮮、中國在傳統東亞秩序中，或近代西力東漸的情勢下，如何因應並因而能夠體現哪些意涵。透過不同地域的研究者所帶來的史料與見解，也令與會者更能增廣見聞，並獲致國內與海外學人的交流成果。

中研院是國內學術研究的頂峰，近史所亦為中國近現代史的重鎮，是故由其主辦的學術研討會，向來具有高度的學術水準。然而此次會議的發表人既以在學學人為主，則難免稍為青澀，與過去的研討會有別。不過近史所早在籌辦之初，便已慮及此種情形，認為會議既以青年研究者為對象，心態上自當包容可能出現的瑕疵，並將此包容視為給予外交史研究後進的學術贈禮。其次，近史所亦在會議前端設置查核過程，在公開徵稿時先行要求論文摘要的提供，並由外交史群成員協助審查，以為決定與會論文為何、並確保其具有一定水準的檢核程序。因此，與會論文容或無法與近史所歷來的研討會論文相比，卻不至於粗製濫造。同時，摘要審查之後，亦對遭割愛之論文報名者提供審查意見。除期望能給予這些報名者友善、實際

的建議外，亦盼望藉此努力，能讓無緣會議的外交史研究者，仍能保持其對外交史研究的興趣，讓外交史研究的火苗得以持續。

整而言之，會議最主要的目的便是嘗試運用近史所與外交史群的資源與人力，為國內外交史研究的後進研究者提供發表平臺與寫作建言，拓展外交史研究的未來希望。亦在這樣的目標上，結合「研討會」與「工作坊」的雙重性質，分別設定「論文發表與評論」，及「檔案介紹與交流」的議程內容。此種議程規劃，也是近史所也是少見的嘗試。此不僅體現此次會議的獨特性，也代表了近史所乃務實且認真地，期盼會議能夠真正有助於國內外交史研究的發展。

五、結語

本次會議的主辦人張啟雄教授在閉幕式中提到，外交史研究與國家發展的良窳息息相關，故在國家學術發展的立場言之，沒有遭到偏廢的理由。近史所此次著眼於國內在外交史方面的未來發展而舉辦此次會議，是一值得繼續的嘗試。而發表之論文雖與近史所的其他會議相較，有較多需要加強之處，仍可看出外交史的新進研究者，對該學科持續投入心力。加上獲得黃克武、唐啟華與張啟雄等三位學界先進，肯定其經營已漸有小成的外交史群，對會議的支持與成果，體現國內的外交史研究，應仍具有可為之處。就這層面而言，本次會議實已有相當的意義。

為了延續此一意義，近史所將保有再度舉辦的期待，並思考將此會議延伸為近史所「傳統」，進而持續辦理的可行性。盼能在此次僅係結合近史所的學術聲望，與外交史群的人力投入兩種資源便即完成的成果基礎之上，能在日後獲得更多可能挹注，例如取得如國史館等重要學術單位的合作機會，豐富會議內容、提升會議層次，一同為國內外交史研究的發展，貢獻眾志成城的進步效果。

【註釋】

1. 沈雲龍、李國祁、王聿均、王樹槐，〈「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過去與未來」座談會發言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4期（民國74年6月），頁414。按，引用處為李國祁教授發言內容。
2. 概見林正珍、劉瑞寬編著，《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 第六冊：中國近現代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民國93年6月），頁184。
3. 參見唐啟華，〈全球化下外交史研究的省思〉，《興大歷史學報》，第15期（民國93年10月），頁201-217。
4. 沈雲龍、李國祁、王聿均、王樹槐，〈「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過去與未來」座談會發言紀錄〉，頁419-420。按，引用處為王聿均教授發言內容。
5. 如筆者不久前查證的數據，見任天豪，〈《外交部檔案》與蔣經國「主政」前期外交之概述〉，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中華民國在臺灣關鍵的二十年，1971-1990」學術研討會，民國104年3月7日，臺北：國史館。該數據係由近史所檔案館所提供，再次致謝。
6. 唐啟華等著，《近代中國的中外衝突與肆應》（臺北：政大出版社，民國103年12月），頁263。
7. 許峰源，〈「外交史青年學者研究群」的成長與蛻變〉，《國史研究通訊》，第4期（民國102年6月），頁88-94。
8. 三位負責的外交史群成員為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主任王文隆博士、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蕭道中助理教授、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楊子震助理教授，講題則分別為「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檔案介紹」、「美國外交文獻導論」與「外文檔案運用心得——以日本為例」。
9. 呂慎華所評論之論文為吉辰，〈「自出機杼」的創舉：論晚清外交中的「國電」〉。
10. 三篇論文分別為：王慧婷，〈長春地方當局與駐華領館對萬寶山案的交涉〉；陳禎祥，〈北洋時期海道測量局維護測量主權之考察〉；容世明，〈近代中國的學術外交及其國際化——以參與遠東熱帶醫學會為視角〉。
11. 各學者所主持的場次分別為「從周邊視角探索新看法」、「由主權意識理出新認識」、「自雙邊矛盾獲得新見解」與「藉民間角度構築新展望」。